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詩》與古史——從新出土楚簡談 玄鳥傳說與早期殷史*

饒宗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前 言

古代的史事，沒有太多詳確的記錄留下來。商代的史書，具體的只有《史記》的〈殷本紀〉；幸得出土還有約六萬多片的甲骨刻辭和少數銅器銘文，可供探索。傳世文獻《尚書》的〈商書〉和《詩經》的宋國傳下的〈商頌〉，寥寥幾篇而已。本論文要談的《詩》，是專指《詩經》而言。

東漢鄭玄著〈商頌譜〉，對商代的來歷，略有申說，《詩》中有幾句成為古史的珍貴史料，最重要的要算〈玄鳥〉一篇，其次則是〈長發〉：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玄鳥〉）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長發〉）

這是《詩經》中多麼美麗的句子，久已深深地印入國人的腦海，過去學人包括經學家、史學家、神話學家不知花去幾多心力去尋求解釋，可說是車載斗量。現在姑且撇開不談，試利用近年最新出土一些考古資料，綜合起來，提出我的看法。不久以前，從香港購回北京，震撼一時的西周銅器夔公盃銘辭，開頭便有「天命禹尊土」一句，同於〈禹貢〉，亦和〈商頌〉的「禹敷下土方」一樣。「尊土」即是「敷土」，十分有趣。

我是研究古代史的，特別注意殷商文字和歷史。三句不離本行，今天講演的題目，自然亦是屬於這一範圍。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四十周年傑出學人學術講座講辭（2003年3月1日）。

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徽，採用鳳鳥。校徽的說明：「自漢代以來，鳳即被視為『南方之鳥』，且素為高貴、美麗、忠耿及莊嚴之象徵。」我要談的玄鳥，恰巧是鳳。現在可以說是從校徽說起，帶出我的歷史觀。

《詩經·商頌》所說神話的神鳥，在屈原的辭賦之中，如果我們細心用〈天問〉和〈離騷〉合證，玄鳥與鳳分明指同類鳥而異名。周室之興，鸞鷟鳴于岐山。¹至於後代，每以鳥為得國之瑞。²過去認為玄鳥是東夷的傳說，我於2001年12月在傅斯年講座已指出，玄鳥是在東方與西方共有的信仰。連年以來，有更多的考古發現，可以支持吾說，現在更進一步提出新的論證。許多神話傳說，每每是由「源分而流合」的形態逐漸形成一個系統。³鳥的信仰，亦是如此。請聽我緩緩道來。

玄鳥故事與簡狄

在《楚辭》裏面，屈原的發問，見於〈天問〉說：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馨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嘉〕？該秉季德，厥父是臧。何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條」是地名，為「鳴條」的省稱。史書都說商人代行天罰，放桀於鳴條之野（王逸《楚辭章句》用此說）。《史記·夏本紀》：「桀走鳴條。」又〈殷本紀〉：「桀敗於有娥之虛，桀犇於鳴條。」又〈秦本紀〉：「以敗桀於鳴條。」《書·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孔傳：「陟在河曲之南。」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是鳴條在山西安邑西，因晚夏都於安邑也。史公蓋因《尚書》為說。今從屈子之問，知鳴條亦有時省稱曰「條」。

〈天問〉於桀放之後，問及商人之興有關玄鳥的傳說。案〈離騷〉已不止一次言及有娥。如：「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思美人〉亦云：「高辛之靈晟〔盛〕兮，遭玄鳥而致詒。」王逸謂：「有娥，國名。……謂帝馨之妃，契母簡狄也。」引《詩·商頌》：「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李善引《呂氏春秋·音初》「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以說之。有娥二女，長女簡狄，少女建庇，名見《淮南子·地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以〈離騷〉與〈天問〉互證。簡狄之名，屈原時代已耳熟能詳。「在臺」自即「九成之臺」，「玄鳥致

¹ 《國語·周語上》上內史過論神明語。鸞鷟，鳳之別名也。

² 如唐初竇建德見有大鳥五集于樂壽，以為己瑞，改元曰五鳳。見《資治通鑑》（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卷一八六，頁5825。

³ 參方以智：《東西均·源流》章。

賄」亦即「鳳皇受賄」。故玄鳥不必指燕，亦可指鳳。屈子時的智識已是如此。《續漢書·禮儀志》司馬彪注引〈天問〉句作「玄鳥致賄女何嘉？」即問玄鳥遺卵，而簡狄為何會生子呢。古本如此。⁴

卜辭也見媯之名：

□辰王卜在兮……媯毓。幼。……〔王〕曰：吉，在三月。(《合集》38244)

媯，殆與有媯是一族。有媯的地望，《淮南子·地形訓》分明說道有媯在不周之北，是在西方。屈子〈天問〉在「簡狄」二句之前，記夏桀滅喪之事，屈子問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指伊尹〕。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條」為「鳴條」的省稱，洪興祖補注：

《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云：「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媯之虛，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

「條放」一句，足證楚人所傳古史，有桀奔鳴條之事。

我們根據〈殷本紀〉，桀敗於有媯之虛，桀奔鳴條。〈夏本紀〉云：「桀走鳴條。」鳴條地在安邑。《書序》稱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與《書序》所說正相符合。是有媯之虛近於鳴條（《括地志》以安邑北三十里即古鳴條陌），地不應在東夷，而應在西方，近於華山。再以陟地證之，陟一地名，見於卜辭，有「而伯龜」其人。

桀的疆域，據吳起說：「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在上党壺關，可見鳴條地望，當於安邑求之。山西晉地，自來說是「疆以戎索」，與異族為伍。樂產《括地譜》謂：「〔桀〕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夏之後代，亡入匈奴，自是可能的。

華山向來是西方的「冢山」，祀典至隆而用太牢。《山海經·西山經》稱「齊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從華山在祀典的地位，及有媯地望在不周諸項看來，毫無不合之處。契所封之商，自以在太華之陽為宜。

〈商頌〉談商人的興起，還追溯到大禹，〈殷武〉篇亦說：「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必提到「禹績」，證之上海楚簡，子羔向孔子請教討論古代三王之道，三王就是禹、契、稷，⁵〈離騷〉稱為三后純粹。商人是繼承大禹治水的業績，開拓疆土以立國。〈商頌〉疊用「有截」一詞，計共三次。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又說：

⁴ 參湯炳正：《楚辭類稿》（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頁302。

⁵ 李零：〈上海楚簡讀記〉，《中華文史論叢》第68期（2001年4月）。

「九有有截。」「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相土是夏世的人。《遁甲開山圖》引榮氏云：「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太平御覽·天部四》引）把簡狄吞卵的神話，轉移到大禹身上。改馩為雞，與鄭玄《詩譜》說簡狄吞馩卵而生契大異。又秦人先代亦有女修玄鳥吞卵，生大業的神話。甘肅禮縣出土的金箔飾片亦作鷗鼻形狀，以鳥為圖紋標誌。⁶可見玄鳥在古代流傳之廣。于省吾曾舉銅器的玄鳥婦壘「婦」三個字結合在一起，說明這就是古代鳥圖騰遺跡的物證，其說已見於一般通俗讀物。玄鳥可以是鳳，是燕，是鶴，是雞，其說流行，十分普遍，玄鳥不一定是馩（燕子）！

茲將簡狄異文列出如下：

- 簡邈 （《漢書·古今人表》）
- 簡易 （《史記索隱》引舊本）
- 簡逖 （《路史·發揮》）
- 簡翟 （《淮南子·地形訓》）
- 娥簡 （《潛夫論·五德志》）
- 女狄 （《遁甲開山圖》引榮氏）



《集成》9794.1

按「逖」與「邈」字，乃「狄」的繁文，「翟」、「狄」一字，《淮南子》作「翟」。帝侖次妃應是狄人，此有如周王之有狄后。

上海楚簡（二）〈容成氏〉篇記湯伐事云：

起師以伐岷山氏，取其兩女琰、琬……陞自戎遂，……桀乃逃之鬲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攸〔條〕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奔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奔之蒼梧之野。（簡38，39，40，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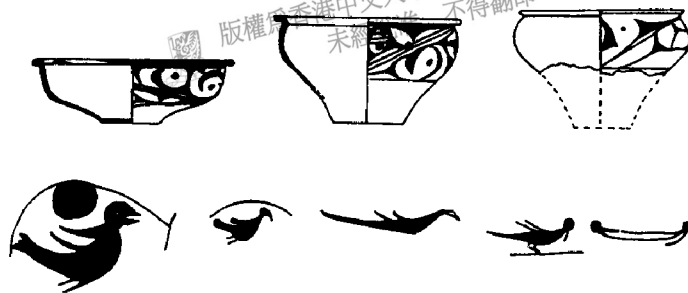
奔蒼梧之野，可能係涉舜事而誤。所謂「鬲山氏」，即鬲山氏。郭店簡〈窮達以時〉：「舜畊於鬲山，甸於河匡，立而為天子。」鬲山即歷山。殷卜辭有地名鬲，字亦作馩。《墨子·尚賢中》：「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又〈尚賢下〉文略同。此與《史記·五帝本紀》所記無異。《集解》引鄭玄云：「在河東。」《水經·河水注》蒲坂謂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漁雷澤」句，《太平御覽》引《墨子》作「濩澤」。《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水經·沁水注》濩澤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

桀逃之鬲山氏即河東的歷山，足證鳴條地望應在晉境，運城東北，與夏都安邑相近。〈容成氏〉篇言「戎遂」，當即指有娥之隧。

⁶ 參看拙作《古史之斷代與編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年）。

鳥的崇拜和象徵

鳥和飛鳥的信仰，文獻上可以追溯到夏代或更前。墨子是尊夏道的學人，他又迷信古代確有鬼神精靈的存在，他在〈明鬼〉篇下說道：「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以〕及飛鳥，莫不比方，矧茲人面。……』」他引用的《商書》，一本作《夏書》，這是他看到的佚書。何謂「比方」？《莊子·田子方》言：「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萬物都順著日東升西沒的模式而進行作息。殷卜辭常見「出入日」的習語，因為這是自然律，飛鳥亦隨著日的出入而飛翔。考古學上最有趣的物證，在仰韶期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盆上面的花紋，正充分顯示當時人們對鳥和太陽結合的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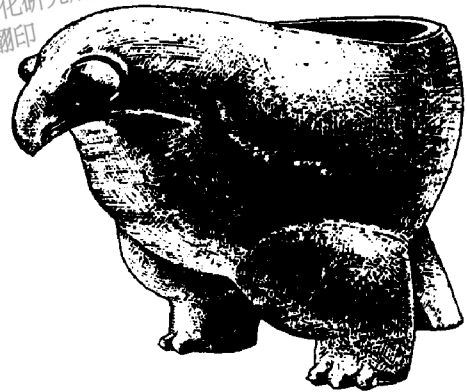


廟底溝類型

在華縣泉護村太平莊遺址，出土黑泥質大陶鴉鼎，⁷ 高達36厘米，氣象莊嚴，已被認為仰韶文化唯一鳥類典型的神化遺物，是中原地區文化可與紅山文化壇廟塚相呼應的實證。⁸

梟的崇拜及其意義非常複雜，有吉文凶二義，我有另文詳細討論。華縣古住民何以造此巨梟鼎？秦昭王曾與天神博於華山。六博以得梟者為勝，梟以勇敢取義。泉護村人對對「梟」的突出，可反映仰韶期對梟類認識和使用於器物上作為紋樣的先進作用，引出後此許多銅器和玉器、金器上「梟」的模式之盛行。

我們從廟底溝文化以鳥代表太陽和梟形的尊嚴，可見西方的華山在仰韶時期已盛行鳥與太陽崇拜，遠在少昊時代之前。大汶口文化陶文的太陽形象，年代更在其後了。



華縣泉護村遺址大墓隨葬大陶鴉鼎（《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頁72）

⁷ 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頁51-82。

⁸ 郭大順：《追尋五帝》（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

至於飛鳥的形狀，器物上紋繪表現有種種形態。河姆渡骨匕的雙鳥負日，和骨蝶形器上的雙鳳朝陽，反映遠古(七千年前)越人的鳥與太陽崇拜。良渚玉器帶有玄鳥，而壁上圖案大致作有冠冕帶雙翼有尾的太陽符號，是神化了的太陽，充分表現鳥與太陽結下了不解緣。《山海經·大荒東經》記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見於三星堆的巨型神木樹，枝上都棲著銅製神鳥，栩栩如生。又牙璋嘴上亦刻鑲神鳥，都和太陽崇拜有密切關係。成都金沙銅璧形器三鳥飛翔圖紋，最令人矚目的是金飾作四翔鳥繞日圖形，正如《山海經》所說的「使四鳥」的神態。金沙還有鳥首無紋的金帶，與三星堆的魚鳥紋金杖正互相輝映。⁹

《大荒西經》說：「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大荒南經》：「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帝俊是天帝。楚帛書稱「帝俊乃為日月之行」。帝俊在神話上是一位可以驅役日月的天帝，有如陽光普照，無遠弗屆。成都漢畫像石上的羲和作人首鳥身與陽鳥翱翔之狀。天虞即天吳，亦是鳥首人面虎身十尾的神物(見道書《寶真上經》)。由於陽鳥神話的傳播，韓國高句麗時代，壁畫亦有「陽燧之鳥」的題榜。

紹興306號墓出土有銅屋模型，屋頂上有立鳳鳥。良渚出土的玉璧，上面一般亦刻繪著立鳥正相似。良渚璧內又刻繪張雙翼之鳥，夾著太陽與日月，可能表示鳥是天使的意義。

晉崔豹《古今注》云：「司風鳥，夏禹所作。」把司風鳥儀器的發明，亦歸功於禹。占星家認為「風是天地的號令，陰陽之所使」。緯書《龍魚河圖》說：「風者，天之使也。」風是天使，殷卜辭有云：「于帝史鳳〔風〕二犬。」(《通纂》上98，通別2.6.3)這說明風是上帝的使者。古代一般人借「鳳」字代表風，二字同音。四方的風神各有專名，使四鳥，應指四方司風的神明。風占是人們生活上必關注的大事。¹⁰

既知鳳是上帝使者，秉天的號令。從鳳的運行的狀態可觀看氣候的變化來定季節，因此有「相風」預測天文氣象的工作，即所謂「觀象授時」。古人把鳳鳥表現在器物的圖樣上便有許多花樣。鳳鳥所以與曆正(官)發生密切的關係，其理由在此。

現在再談玄鳥，由於使四鳥以配合四時，司分的鳥便被稱曰玄鳥，代表春秋分的鳥是燕子，亦即是玄。其實「玄」的意義有天和黑二義，黑代表北方。夏人尚黑的顏色，故玄鳥配上北方帝顓頊，稱曰「玄宮」。《墨子·非攻下》云：

高陽乃命〔禹於〕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衰〕。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

⁹ 參看《金沙淘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¹⁰ 參劉昭瑞：〈候風鳥與相風鳥〉，《華學》第五期。

〔曆〕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隋巢子》作「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這是「人面鳥身」之神勾芒，墨子認為他是司天的瑞令之神。三星堆有人首鳥身作四翼像，可以墨子證之。禹征有苗，要靠這位人面鳥身的神力。

鳥是太陽的記號，所以少昊用鳥來紀官，即以鳥司曆。王嘉《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鄭子說：「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又說：「五鳩，鳩民者也。」（《左傳·昭公十七年》）許慎《說文·鳥部》「焉」字下云：「凡字，朋者，羽蟲之長；鳥者，日中之禽；〔駿鳥〕鳥〔鵠〕者，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鵠背太歲。』〕；燕者，請子之候。作巢避戊己。」許氏所說諸禽，都和曆法有關。司曆是宇宙性的天文工程，由於鳥（太陽）的信仰是宇宙性的，不能局限於東方的夷人。玄鳥的傳說是東、西所共有的，正如墨子所說如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方，一切「莫不比方」。

鳥在北方的地位非常重要。〈容成氏〉篇云：「禹然後姑為之號旗以辨其左右，思民無惑。東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號旗」即《周禮》所謂「常」。〈春官·司常〉云：「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鄭注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把旗幟分配四方和中央，可見是時已有五（行）的觀念。而四靈的配置，尚未成立，故以鳥屬於北方，與四靈之以朱鳥屬之南方不同。以鳥屬之北方。這一制度據此說亦是起源於禹。《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此四代旗幟之別。鄭玄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稱為「號旗」，鄭說是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帝令燕往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以燕子列之為北方之音，有它的道理。

《山海經·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張掖記》：「黑水出縣界雞山，昔娥氏女簡狄浴於玄丘之水。」亦見《宋書·符瑞志》，地名玄丘之水，與玄鳥之玄，正相符合。地有黑水，顏色尚黑；又有幽都之山，當指北方，故《呂氏春秋·音初》篇以指北音，不是東音；再證之新出土的〈容成氏〉篇把鳥的方位，列於北方，可能是出於夏人的安排。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篇記風占，次其日數，以知戰之緩急。「以午夜之昏，至於〔人〕靜，以見玄鳥於〔北〕斗旁，雖癸卯雨，猶是必戰」。此出兵陰陽家言，「玄鳥」亦被使用於軍事占候。¹¹

¹¹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楚簡記玄鳥和坼背降生的傳說

最令人驚異的是從香港購回上海的楚簡，其中竟有玄鳥傳說的記載，很值得提出討論。上海楚竹書第二《子羔》第十簡云：

悤而畫於怀〔倍=背〕而生=〔生〕而能言是墨〔禹〕也。

坼〔禹〕之母又〔有〕迺〔乃=戎〕是〔氏〕之女。(下殘)

有迺氏即是有娥氏。本校文物館藏楚簡第3號亦有相關的文字：

悤〔志〕而畫於雁，生乃諱〔呼〕曰(下殘)

「雁」字，馬承源讀為雁，謂是雁。愚見當釋為雁，讀作膺。《說文·肉部》：「膺，胷也。从肉，雍聲。」又《勺部》：「勺，膺也。」此謂畫於胸，生乃自呼。又上博第十一簡：

……也，觀於伊而尋〔得〕之_𠄎品也。遊於央臺之上，又〔有〕馯監〔銜〕_𠄎〔卵〕而階〔措〕者〔諸〕其前，取而軟之。_𠄎〔惠〕。

是簡明很明顯地有「馯銜卵」之說。「馯」字从鳥，區聲，與燕之作鄔同例，證明燕銜卵生契的故事，在孔子時代已十分流行。

又第十二簡：

欽，是_𠄎〔契〕也。句〔后〕稷之母，有郤是〔氏〕之女也。

「契」字楚簡作_𠄎，即_𠄎的異形，有三岐象蟲的動物。「契」字這樣的寫法為前此所未知。

「自言其名」一事，《大戴禮·五帝德》記宰我問孔子關於帝嚳之事，孔子答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高辛和禹一樣「生而能言」，「自呼」。大聖神靈的記載，一向認為出於緯候後起之說。現在楚簡所見，孔子與子羔問答已有這樣的記錄，可知春秋時人已流行。緯書產生的年代，又要重新考慮了。

背脇出生，古代實有其事。《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產〉引「丈夫民」事云：「殷帝太戊使王英……產子二人，從背脅間出。」《山海經·丈夫國》郭璞注云：「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所謂畫於背而生，即從背脇出生。

再看一條非常有趣的記錄。禹的母親生禹事，見於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太平御覽》卷八十二〈皇王部〉引云：「伯禹夏后氏，姁姓也，母曰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拆而生禹於石紐。」《御覽》卷三百七十一〈背〉引《帝王世紀》云：「簡翟浴玄丘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緯書《尚書帝命驗》云：「禹白帝精，以星感，脩紀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姁戎文禹。」（《御覽·皇王部》引）。脩紀即是禹的母親修己。又《尚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于流，娥簡

拾吞，生契封商。」這些過去認為不可靠的傳說，竟有它的來歷！

近時馬承源先生解說良渚玉璧上的大眼神徽，他認為是良渚人始祖從母體剖背而出的畫像。他引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言「天將授禹，主地……，至於生發於背」，一段文字作為佐證。¹²

依目前所知，成都金沙村遺址已發現有玉琮十件，其一高十節的長琮，大家均同意是良渚典型遺物的向西傳播，古越人勢力已遠及蜀地，沒有疑問。《墨子·兼愛中》載禹治水，「東流之，五湖之處」。越人與蜀，可能在禹時候已有接觸。琮口的神像作很簡括的勾勒，應該代表甚麼用意，至目前為止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尚待仔細探討。如果說是代表始祖神降生的模式，便說「照紋樣所云：也應是禹和契相似的出世方式。」則很難言了！關於剖背出生的說法，緯書有大量渲染性的加諸古代聖人的演繹近於感生說的記載。祝融八姓的來源，見於《大戴禮·帝繫》，及《世本》分明都說，陸終氏娶鬼方氏妹女隤，從左右脅生出。我曾考證這種脅生拆背傳說，波斯、印度有其遠源，像佛陀脅生，舉手而言，是因襲大神 Indra 而來。陸終所娶鬼方氏當是印歐語系人種，拙說已為人所接受。¹³ 現在從《子羔》簡孔子談及禹「怀〔背〕而生，生而能言」一事看來，此中有外來成分，不可不知。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所能解決！

玄鳥神話的沾溉，在西土特別發達。西周銅器使用鳥紋十分豐富，晉國墓葬出土鳥紋更盛行。在山西曲沃村晉侯墓和戰國時期的趙卿墓，玉器、銅器經常出現人首鳥身像。陶正剛考證以為受到西周立國「赤鳥銜珪」的影響。我在矢侯鼎「筆談」中談到該墓鳥形蚌飾成堆的情況，舉《山海經·西次三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鳥皆文首」，認為是崇祀少昊金天氏在西方地區文化的遺留。其神居魄氏之宮，司反景。和弇茲之山即日入的崦嵫，在西海階中，其神亦是人面鳥身，情形相似。日出的扶木與日入的若木都以鳥象徵太陽，崦嵫亦然。鳥的信仰分布東西，這亦是一個例子。到了後來道教徒再加以渲染，遂有月氏國人鳥山的神話了。¹⁴

周人與西域赤鳥氏有淵源，《穆天子傳》云：「赤鳥氏先出自周宗。大王賈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封丌(其)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考王家台秦簡《歸藏》有云：

𠄎：昔者赤鳥卜浴於而見神為木出焉，是音□(523簡)¹⁵

¹² 馬說見他的新著：〈商代青銅器紋樣屬性溯源〉，《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九期。

¹³ 拙作見於〈燕京學報〉新三期(1997年)。

¹⁴ 陶正剛：〈晉國鳥紋的再研究〉，載《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曲沃晉侯墓筆談〉，《文物》2002年第5期。

¹⁵ 參看拙文〈古史之斷代與編年〉上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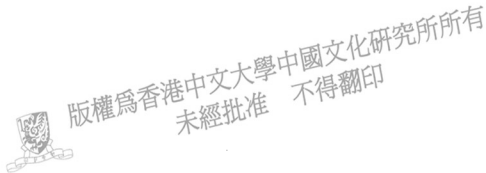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是赤鳥在殷時的傳說，有它的遠源。晉地鳥紋銅器十分精緻。太原趙卿墓有天雞，考《呂氏春秋·古樂》記「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帝嚳即高辛氏。天翟是天雞，《說文·羽部》：「翰，天雞也，赤羽。」引《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鷦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周書·王會》篇文作「蜀人以文翰」。又《說文·鳥部》：「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亦見《王會》篇云：「西申以鳳鳥，……氏羌〔以〕鳥，巴人以比翼鳥。」巴蜀人在周初建國致貢，皆以玄鳥一類，被視作神物。三星堆銅神樹之為建木、若木，已為大家所公認，是樹「太皞爰過，黃帝所為」（《山海經·海內經》），追溯到日神的太皞，古蜀人的太陽崇拜，從《山海經》得到明證。帝嚳看到天翟舞蹈，而心中高興。天翟是天翰，亦蜀人所獻，可見三星堆眾多鳥型遺物，說是先代玄鳥傳說籠罩下的產品，亦不為過！

總上所論，可得結論數點如下：

- 一、從楚簡〈訟〔容〕城〔成〕氏〉篇，可知以玄鳥為燕子，契母簡狄吞卵而生契的傳說，在春秋以來已甚流行。
- 二、「剖背生契」之說，原見於緯書，漢後人沿其說，今於楚簡有畫杯〔背〕而生之言，可見此傳說之早。本校文物館簡「畫於雁〔胸〕，生乃諱曰」斷文殘簡，作為輔助證據，更足珍貴。
- 三、由楚簡證桀奔鳴條與歷山相近，其地當在山西；而有娥氏，簡文亦作「又〔有〕迺〔戎〕是〔氏〕」。
- 四、夏人將鳥列於北方，故《呂氏春秋》以燕子為北音，配合帝顓頊之玄宮。
- 五、飛鳥的信仰起於夏代或更前，以日配合鳥，鳥成為太陽的符號，已出現於仰韶文化，南方越地更早。
- 六、《山海經》「使四鳥」的神話，得到成都金沙遺址所出的四飛鳥繞日的金飾，可作為具體的證明。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Book of Odes* and Ancient History: Some Remarks on the Dark Bird Legend and Early Yin History Based on Recently-unearthed Chu Bamboo Slip Writings

(A Summary)



Jao Tsung-i

The present lecture, delivered by Professor Jao Tsung-i as the firs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0th Anniversary Distinguished Lectures on March 1, 2003, summarizes Professor Jao's research on the *xuanniao* 玄鳥 (dark bird) legend in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bearing on early Yin 殷 (Shang 商) history. His main findings, based 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ancie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recently-published Chu 楚 bamboo slip writings, are discussed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ings:

1. The *xuanniao* worship and symbolism. A constant companion of the sun, the bird was widely worshipp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un worship in Shang civilization as evident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finds. It mirrors the ancient people's reverence for the sun as the fountain source of life in a predominantly agricultural society in north China. The bird also came to represent the Wind (風), regarded as the messenger of the High God (上帝), hence the four directions of the wind were symbolized by four birds in Shang motifs. This symbolism inspired the association of the bird with the "four seasons" (四時) and "five phases" (五行) in ancient cosmology. *Xuan* is dark, the colour of the north, and hence that of the Shang. A reference to the *niao* (bird) ideograph serving as the emblem of the North in the pentagonal geographical divisions of the Xia 夏 state of Yu 禹 is found in a passage in the "Rongcheng shi" 容成氏 chapter of a Chu bamboo slip writings collection recently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useum.
2. The *xuanniao* story and Jiandi 簡狄. As reported in the *Odes* and elaborated in Sima Qian's 司馬遷 *Shiji* 史記, Jiandi, the second consort of Emperor Ku (帝嚳), a grands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黃帝), gave birth to Xie 契, progenitor of the Shang people, by swallowing an egg laid by a dark bird descending from heaven, thus the genesis of the legend. The *Odes* reads: "Heaven commissioned the dark bird to descend and give birth to the Shang." This ethnogenesis myth of the Shang people centred in the bird cult proliferated in various forms in ancient documents, bronze vessel inscriptions and Chu bamboo slip writings. It also inspired similar legends of association with the birth of Yu of Xia and of the ancestor of the Qin 秦 state with great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references to Jiandi's whereabouts in the bamboo slip writings, moreover, are very helpful in verifying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Shang enfeoffment in the south of Mount Hua (華山) in modern Shanxi, situated to the west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3. The *xuanniao* story and the legend of the “rib-birth” (背脅出生). As references to the dark bird’s egg-laying story are found in the “Zigao” 子羔 chapter of the aforementioned Chu bamboo slip writings collection, which also mentions the famed “rib-birth” story of Yu of Xia, i.e., Yu was born from slitting the back ribs of his mother, we can now confirm that these stories were already in vogue in Confucius’s time, not as late as the apocrypha (緯書) of the imperial era. The presence of the bird’s egg-laying myth in the eastern land of ancient China, as well as the appearance of bird motifs in bronze vessels and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human-head/bird-body statues in two Shanxi tombs of the early Zhou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espectively, further attest to the popularity of the bird cult and bird worship across the east and west in north China. It is also significant that in the Mawangdui 馬王堆 silk manuscript *Xingde* 刑德, a treatise on strategy, the dark bird appeared as a deity connected with prognosticating military movement.

In short, the *xuanniao* legend and bird worship were widespread from east to west in north China in ancient times. They represented a salient aspec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distinguished ethnographic and nationality traits. The bird was deeply revered as a symbol of good omen and people’s love of the bird had been luxuriantly manifested in various forms over the millennia. It remains a popular subject for scholarly investigations and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nd non-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as well as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